

# 学习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的“知行合一”

□ 杨香菊 刁兴泽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家，同时又是读书治学的大家，特别是研读马列经典的大家。他一生不仅把研读马列经典看成人生第一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研读马列经典始终坚持知行合一。正因为这样，才使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使他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

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首先在自己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上坚持知行合一。《共产党宣言》是他一生研读遍数最多、读的最熟、读的时间最长的马列经典。他曾对斯诺说，1920年有3本书建立起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其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完整系统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思想。伟大导师列宁曾评价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五四运动以后，《共产党宣言》逐步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毛泽东反复研读，其中的重要内容和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这对他从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不拘泥于外国文本，而是追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知行合一上做文章，使自己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成功指导中国革命理论成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它是毛泽东从1932年开始扎实读了两年的马列经典写成的。《反杜林论》也是毛泽东读了又读的一部马列经典。这部著作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部哲学经典。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一般极少成段地引用



马列原文，但在他的名著《矛盾论》中，却大段地引用了《反杜林论》中的“辩证法·量与质”。指导中国革命的哲学名著《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做到了知行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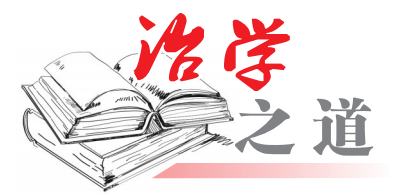
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在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上坚持知行合一。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毛泽东读了又读。他想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到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这两本书，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着深刻的理解。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特别提出，要求领导干部读5本马列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其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讲的是“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直接引用了这一思想。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

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194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又重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上坚持知行合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经济学经典著作上来。这一时期，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最多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经典，它是斯大林对苏联30多年

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很想从这些书中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理论问题及解决办法，及时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所出现的错误。毛泽东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间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他研读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以便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时，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发生的问题，目的在于纠正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统一全党的思想。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与传统所有制观念决裂，建立公有制方面的论述研究得更加仔细，他很想从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答案。《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这部不朽巨著，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内部矛盾，无可辩驳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性，从而把社会主义学设置于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954年他又重新研读《资本论》。1954年之后，他又反复阅读《资本论》。为了便于阅读，人民出版社还专门为他印刷了大字本的《资本论》。

善于用理论经典武装头脑，用理论指导实践，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研读马列经典坚持知行合一。这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研读马列经典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 思想战线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读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 赵纪萍



重视思想战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81年7月，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文中，指出了当时思想战线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其本质，并对如何做好思想战线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对于增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发借鉴价值。

### 思想战线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但存在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作中存在着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二是工作状态软弱涣散。

就前者来看，邓小平认为，思想战线工作存在着搞一刀切、搞围攻、搞运动的现象。他指出，这种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是不利于解决思想战线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要求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既要避免扩大化的问题，也不能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就后者来看，邓小平认为主要是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丢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他指出，“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

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在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他举例说：“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他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思想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有效武器，必须坚持。但遗憾的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这直接导致了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

### 问题产生的原因、危害及本质

在谈话中，邓小平重点分析了思想战线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危害及本质。

思想战线领域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邓小平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二是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指出，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有些人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导致思想战线工作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涣散。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大量涌入，影响到了理论界和文艺界，出现了假借“双百”方针和解放思想之名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盛行，造成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进而造成了思想领域的混乱和精神污染现象。

在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战线领域存在问题的危害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他认为，思想战线工作如果长期软弱涣散，任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蔓延滋长，而不进行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就会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人民群众对党的离心离德的情绪，导致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就会使一部分人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

他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为此，他特意以一些文艺作品为例，指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引导工作，这些文艺作品受到批评以后，有人就认为这是在“打棍子”，背离了“双百”方针。

### 如何做好思想战线工作

思想战线工作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思想领域的斗争往往很容易发展成为政治斗争，思想战线工作软弱无力会涣散人心、造成混乱，会阻碍社会进步，使党的事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针对当时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和思想战线工作涣散软弱的状态，邓小平提出了做好这一工作的根本遵循。

首先，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正如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有其服务的思想意识。如果一个政党不牢牢把握对思想工作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它的政权就必然受到危害，甚至会被颠覆。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的“九个坚持”的根本遵循时，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其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注意做好引导工作。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演讲、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澄清思想混乱，统一思想，坚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最后，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工作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搞政治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他主张，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各种错误思潮，达到思想统一。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对于做好当前思想战线工作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启发借鉴价值。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思想领域中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前进。



40年前，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面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亦同步进入全新阶段。如今，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的历程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未来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外交部军控司王群司长主编的《当代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一书即是这一背景下的重要著作。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政策的系列调整与变革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总结该领域外交变迁可管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当代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为解读我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提供了一个权威文本。该书梳理了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的历史沿革、内涵与外延，并对我国军控外交的实践分期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还在国内首次对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在这一领域，我国走过了奠基时期，经历了全面参与时期以及大力拓展时期。

首先，这是我国与国际军控与防扩散机制实现完全“接轨”的过程。我国曾经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因而没有加入多边军控机构和机制，没有参加某些多边军控条约的谈判，更不可能签署那些协议。改革开放让我国逐步与现存国际军控机制和制度安排“接轨”，我国陆续加入裁军谈判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桑戈委员会、核供应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签署了核、生、化和常规领域的条约和议定书，并积极参与了诸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和该条约的审议大会等。

其次，这是我国政府部门分工逐渐明确和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逐渐完善的过程。部门分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我国于1983年起开始任命专职的特命全权裁军事务大使常驻日内瓦参与裁军谈判会议相关工作，于1997年成立了专门处理战略安全与军控事务的机构——外交部军控司；二是各政府部门细化分工和协调，各自处理涉及核、生、化和常规武器相关的事务，例如商务部成立了专家委员会、设立专门处理出口许可审批部门，我国还成立了国家原子能机构对接国际原子能机构等。除了分工明确，我国还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严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条例、法规和法律体系，并根据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我国政府部门的设置和分工、跨部门的协调，与之相应的法律和法规

## 透视国家战略安全的一个视角——评《当代中国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

□ 樊吉社

均已经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

最后，我国在战略安全与军控议题上逐步完成了从国际军控事务的边缘力量走向核心角色的转变。我国曾经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曾经是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防范对象，曾经遭受其他国家的禁运、制裁。如今，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已然是战略安全与军控领域至关重要的力量和声音，成为各国寻求支持、协调与协作的重要国家。事实上，在处理中东、南亚和东北亚等地区核扩散挑战时，中国均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没有中国的不懈外交努力和诸多实质贡献，地区防扩散问题很难取得如此多的重要成就。

我国与现存国际军控与防扩散机制的接轨、我国政府部门分工明确、相关法律法规日臻完善、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战略安全与军控事务，这是我国在这一特定外交领域走过的历程，更是微缩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与世界关系调整、转变和升华的历程。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塑造与引领战略安全与军控外交进程的阶段，未来我国必将是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

## 2018年第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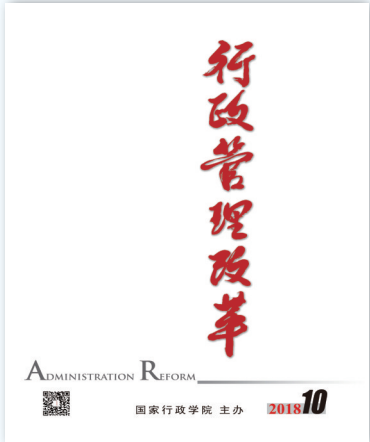
### 《行政管理改革》目录

【省部长笔谈】  
李谦 河北坚持综合治霾 打赢蓝天保卫战  
彭佳学 浙江“五水共治”的探索与实践

【本期关注 纪念改革开放40年】  
王健 王立鹏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宏观调控  
沈荣华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40年的启示和新趋向  
马宝成 安森东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40年：主要成就和未来展望

【本期聚焦 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 特约主持人：刘莘】  
刘莘 余积明 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法律规制概况  
王静 网约车给中国出租车行业及其监管带来的变革  
姚瑶 中国共享民宿的制度规制路径探析  
樊裕 共享单车地方法律规制的改进和完善  
——以北京等九地市规范性文件为例

【社会治理】  
陈鹏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进展、问题及对策  
黄铁苗 徐常建 关于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思考



【法治政府】  
韩春晖 盛泽宇 协同执法：铁路安全监管体制变革之维  
王松 论《统计法实施条例》对统计数字腐败的规制创新  
周顺忠 叶晓川 新时代中国公安羁押监管制度剖析

【调查与思考】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浙江桐庐：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比较与研究】  
黄燕芬 党思琪 杨宜勇 英国伦敦市公共服务清单制度研究